

骑两匹马的人

李惠薪 著

对于我来讲，医生和作家可以在一个身上统一起来，成就一番事业，契诃夫已为我树立了榜样。

医生与作家可以与我相伴终生。

也许有一天，我可能先放下手中的听诊器，但却不会放下手中的笔，如果人可以再生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时挑中医生和作家两个职业，再到人间潇洒走一回！

李惠薪回忆录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骑两匹马的人

李惠薪 著

李惠薪回忆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骑两匹马的人—李惠薪回忆录/李惠薪著. —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80154-559-1

I.骑… II.李… III.李惠薪—回忆录 IV.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9090 号

骑两匹马的人—李惠薪回忆录

李惠薪 著

※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)

电话: (010) 84026161 84026019

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mm 1/32 7.625 印张 162 千字

ISBN 7-80154-559-1/G·551 定价: 11.00 元

目 录

-
- 1 / 苦难的童年
4 / 关于母亲
7 / 迁徙北平
13 / 关于父亲
18 / 孟母择邻
22 / 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流产
36 / 脚踏医学和文学两只船
42 / 初入临床医生之门
51 / 远行人
60 / 逃脱“噩运”
66 / 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澜沧江畔》的出版
76 / 重新站起来
84 / 时间的乞丐
91 / 第一次踏上雪域高原
99 / 二次进藏——罗布莎的帐篷城
106 / 碧海青天夜夜心

目 录

118 / 医生的职责
124 / 快乐的云
133 / 恩重如山
138 / 我要看看世界
146 / 飞往大洋彼岸
156 / 搬进了 Marie 的家
168 / 为你破例!
178 / 写《流浪姐旅美打工记》的前前后后
190 / 归去来兮
205 / 军团菌病大战
212 / 东渡扶桑
222 / 《月是故乡明》的出版
229 / 永远心存希冀
233 / 主要文学作品目录
235 / 主要医学论文目录
237 / 后记

苦难的童年

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开外了,我是她的第七个女儿,虽然前四个均在不满一岁相继夭折,但还是活下来了三个“丫头片子”。不难想像出当时母亲那沉重的心情:懊恼、悔恨、沮丧,甚至绝望。半个多世纪前,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。特别是当时家境并不宽裕,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,靠出卖体力为生,在鸡西、鹤岗一带做煤矿工人、建筑工人,母亲一人在家操持。应该感谢母亲,在她怀胎九个月,历尽妊娠时的磨难,生男孩的渴望而事与愿违时,她从没有萌生要将我们扼杀在襁褓中的恶念。母亲含辛茹苦地哺养着三个女孩子。

我与二姐仅差一岁多,这为母亲的看管添了很多麻烦。就说喂奶吧,每次都是一场小小的“搏斗”,由于我最小,母亲自然是将有限的奶水先给我。而长一岁多的老二,也非常渴望吸吮到母亲的奶汁,她先是围着母亲身边转,当她失去了耐心的时候,会突然伸手抢走我口中的乳头,常常是两个孩子扯开了喉咙,哭得泪流满面。我们哪里理解、体会母亲那满腹的忧愁和苦闷。

迫于社会上和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,当时作为一个女人,一个依靠丈夫、经济不独立的女人急于想摆脱生活的窘境,曾请过

多个算命的先生占卜，这些算命先生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母亲犯了“九女星”，必须生够了九个女孩后，才能看到儿子。他们也讲了躲避劫难的招数：要将我当做第九个女儿，故起乳名老九。捎带着为我占卜了一卦，我在天宫原本是站在王母娘娘身旁端花盆的童女，由于贪恋人间烟火，私自下凡，随时有被天兵天将缉拿“归案”的可能。逃脱的办法是，每年在我的生日时，都要到供有王母娘娘的庙中烧香拜佛，请求宽宥。由于当事人年龄小，由母亲代行此事，可谓“女债母还”，尚需糊一纸童女当场焚烧，算是我的“替身”吧！如果天上真有王母娘娘的话，不知这样明目张胆地以假充真是否可以得到宽恕。母亲不敢怠慢，一方面是为了已出生的女儿，另一方面也为了要截住那即将要来到人世的另两个女儿。

小时候我对自己所犯的天堂的戒律自然是一无所知，当我稍稍懂事时才发现自己的头发与周围同龄女孩不同，她们扎着小辫，就连两个姐姐都留着娃娃头，可我的头发是头顶上那层留着，下面被掏空了一圈儿。与小朋友们玩耍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要去掀我的头发，那时就会露出了青青的一道头皮，他们叫我锅圈秃子，又说我的头是道里道外（当时我们住在哈尔滨）。为此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而且从小养成了一个“护头”的习惯，每次剪头发和母亲间都是一场“生死”搏斗，平日和蔼可亲的母亲，此时面目全非，凶神恶煞似的，我终因年小力弱败下阵来。

烧香、许愿、烧纸童女这一程序，严格地执行着，直到我已上了小学，而且是从北京专程回哈尔滨。最后一次，庙里的和尚让我站在一条高高的凳子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用扫帚疙瘩敲了下我的脑袋，又猛在背上推了我一把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，“咕咚”一声摔到了地上，顿时委屈得大哭起来，身上沾满了尘

土,泪流满面的脸,仿佛“泥猴”一般。不过我的“劫数”总算是过去了,这惊心动魄的场面,虽已历经半个多世纪,但那栩栩如生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。

母亲却没有逃脱“九女星”的噩运,在我之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。母亲共生了十一个孩子,有两个男孩,但都不足周岁就夭折了。曾听母亲不只一次地长叹过:“命中无子!”尽管她热望、期盼、酷爱男孩,但并没有因此而有意地轻视虐待女儿们,而是尽了一位母亲的责任,用全身心的爱来关怀和呵护我们,将我们放在了社会竞争的起跑线上,鼓励我们,为我们呐喊、助威……



关于母亲

母亲娘家也姓李,是河北省白洋淀的人。家中原十分贫穷,她的父亲和哥哥下了关东,家中只留下了母亲、她的大姐和小哥,大姐长她18岁,已经嫁人。家里没有劳动力,生活自然十分拮据,姥姥去为村里的财主帮工,母亲和小舅就住在破庙里靠乞讨为生。一次讨到半碗饭,路过财主家门,被突然放出来的狼狗追得跌倒了,碗被打破了,划伤了右侧的颧骨,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疤痕。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。身上、头发上长满了虱子,后来头顶上又生了疥疮,因为年幼影响了毛发的生长,头顶有很大一片是秃的,母亲从来都没有留过分中缝的头发。同村跑关东的父亲回来说,姥爷在东北混得不错,还开了一家绳麻铺,这样姥姥带着儿女才下了关东。

母亲初到哈尔滨时,那只是一个刚刚开化的小县城,叫滨江县。当时正普及小学教育,母亲免费入了学,但比同年级的学生都大几岁。她非常用功,不仅勤奋,脑子挺聪明,六年的功课,她花了四年就读完了,在班上她常考第一名。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,要学生画立体的黑板,母亲第一个圆满地完成了作业,受到了老师的赞扬。

她自豪地说:“我家里不富裕,可班上没有人敢欺侮我!”

她被免考送进了初中部,仅读了半学期,由于家中不再供养她,而辍学了。因为家里认为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!快20岁的大姑娘了,不急着找婆家,读什么没有用的书呢!这是母亲认为遗憾终生的事情,这也就不难找出她为了五个女儿的深造,肝脑涂地使出浑身解数的原因了。

母亲曾在女子商店里做过售货员,时间并不太长,后来秉承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与父亲结了婚。这是一桩失败的婚姻,他们几乎是打了一辈子。父亲生性粗鲁、专横、暴烈。母亲实在无法忍受了,在四个女儿出生不久,相继夭折后,曾去一位海军军官家里当奶妈。她说:“这是为了活命!”她随着这家人进了关。但由于父亲去姥爷家寻衅闹事,舅舅们招架不住,将母亲追回。她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我们:“女人也是人,什么人都靠不住,只有靠自己。孩子,别人能干的事情,你就能干!而别人不能干的事情,你要亲自去试,只要下决心,就干的成!”她的这种思想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我们姐妹几个为母亲做了一个粗略的“素描”,概括成:装男扮女、能文能武、南征北战、东挡西杀。这种形容并不过分,父亲就像一个托钵僧似的云游四方,一年中难得在家里住上几天,家中的事,事无巨细都要母亲操持,小到买一根针,大到作出决定举家由哈尔滨迁至北京。

在哈尔滨时家庭生活并不十分富裕。我们住在道外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里,仿佛像现在的一个居委会似的,大院子里有许多条胡同。由于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,收入也是时多时少,母亲除了照顾三个年幼的女儿外,还抽出时间为同济工厂糊糖盒,贴补家用。

她干事非常麻利,也非常要强,从早忙到晚。我们三个姐妹

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的,虽然做工不算上乘,但保证干净、整洁。她不仅会织毛活,还会用钩针钩,好像没有她钩不出来的东西,鞋、手套、书包、帽子……她说使用钩针的基本方法是老师教的,至于钩什么那就靠自己的双手了。

住在大杂院里,与邻里们相处得十分和睦。她真诚,热心助人,不惜力气,还心直口快。当母亲决定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动身到关内时,左邻右舍的都来到家里探望,千叮咛万嘱咐,当时正值兵荒马乱,日本兵已经在东北成立了“满洲国”了。

母亲很喜欢唱歌,但她并不识乐谱。她唱歌时调子很准,《苏武牧羊》这首歌就是小时候听她吟唱而学会的,至今那低沉、苍凉、哀婉的声音还会响起在我的耳边,情不由己地会潸然泪下。

迁徙北平

当我开始记事的时候，哈尔滨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，成立了满洲国。长我五岁的大姐在读小学，她全然是日本小女孩的“外包装”，齐眉齐耳的短发、上衣、短裙，还有背在肩上的书包。最让大姐头痛的是日语课，在课程安排上占了很大的分量，回家来她常常冲妈妈发火，掉眼泪，哭诉着不想学日语。当时私下传说，关内学校里日语课排得少些，这是否是母亲决定离开哈尔滨的原因之一，不得而知。

家中的一切大事必须由母亲一个人来决定，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既不能当参谋又不能做助手。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三个女儿，年长的尚不满十岁，要从哈尔滨迁徙到北平，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嗜杀成性的日寇、凶狠的残匪、当地的恶势力，铁路沿线连绵不断的枪炮声、喊杀声、哭嚎声令人魂飞胆丧。左邻右舍都在挽留母亲，一方面舍不得她离开；另一方面也确实为我们母女四人的安全担忧。但母亲的主意已定。

家里与近邻合住三间平房，堂屋是两家分别做饭的地方，屋内陈设十分简陋，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，仅有一些常用的家什送给了需要的邻居们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只知道玩耍、嬉戏的

孩子来说,坐火车到关里去,到北平去着实是一件十分有趣,也十分刺激的事,颇得周围小朋友们的羡慕,我们完全没有顾及到压在母亲心头担子的分量。

临离开哈尔滨的前夜,孩子们都被母亲安排早早躺下了,为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开始长途的迁徙。半夜醒来时,发现母亲在用报纸围起来的灯下,还在穿针引线地缝补。她将我们的大衣扣子拆下来,正在往里边填放东西。原来她将家中仅有的一点点贵重首饰,都带在了孩子们的身上,这是冒着被日本鬼子杀头的危险的。在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,我们离开了哈尔滨。

父亲在北平并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,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的开销,生活非常拮据,多亏母亲勤俭持家,勉强维持。那时家里在前门一带豆腐巷、操场五条……串房檐。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房子低矮、简陋、破旧,甚至还不如哈尔滨住的,这常常让我想起往日里一起嬉耍的伙伴们。

生活安顿下来以后,母亲很快就四处奔走,为女儿们联系学校。大姐要插班,二姐要读小学,我虽然刚满五周岁,也吵着要去读书,最后母亲还是送我和二姐一起进了小学。学校十分简陋,厕所都是挖的深深的长长的土坑,我由于年纪小,不小心掉进坑里,这样就中断了学习。

那时童年的生活是十分孤寂的,初来乍到,不仅人生地不熟,也没有可以一起嬉耍的伙伴,母亲能给我的零花钱是极其有限的,不仅是没有地方去花,更主要的是舍不得花,全部积攒了起来。一次,大姐与班里的同学一起去中山公园春游,打起了我的算盘,“邀请”我同去,条件是我必须倾囊而出。虽然我非常珍爱自己的钱,可中山公园对我还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,经过再三的权衡、考虑、琢磨……最后我同意了。

从前门的居民区到中山公园,应该说距离并不算太远,去的时候挺兴奋,一点儿也不觉得累,可在公园里转上一大圈儿以后,大姐和同学们划船去了。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,但并非不识数,我知道那船票中有我的钱,我却不能上船,只有站在岸边看着别人划,心中的委屈、气恼、妒忌、悔恨……交织在一起,不是碍着在大庭广众游客们众目睽睽之下,我会失声痛哭的。所有的“财产”都扔在了公园里,连存钱的小纸口袋,回家买电车票的钱都没有了,惟一的选择只有“11路”汽车,这对于一个尚不满六周岁的孩子来讲,无疑是超负荷的体力消耗。事后用妈妈的话讲:“你走回家时,丢盔卸甲,鞋帮子当了鞋底子用,进门后二话没说,一头栽进床里,睡得天昏地暗,连轴儿转,睡了一天一夜才醒!”

这次春游给我的印象深极了,在我幼小的心灵中,烙下了难以更改的想法,而这种想法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,更加加深、加强。那就是不要奢求你的经济实力达不到的“享受”,否则劳民伤财,后果不堪设想。由此而演绎出的,我这人不喜欢游山玩水;不喜欢凑热闹;更不愿意去拼命地追赶时尚。

一年后,家庭经济情况有了改善,我们搬进了西城的国会街,一座独门独院的房子里。这是一所典型的小四合院,院里有北房、东西房,没有南房,院里收拾得挺干净,南边墙根的花池里种的全是玉簪棒,东、西房前边的花池里种的是美人蕉。夏、秋时,院子里开满红艳艳、黄灿灿的美人蕉,还有那白色的清香淡雅的玉簪棒,色彩挺协调,我们姐妹三人去艺文附小(现二十二中)就读,有家里的洋车接送。

其实我很留恋在那所小院里的生活,清静、安宁,父母间虽然也吵架,但正常生活秩序并没有被打乱。后来长大我才知道,

这儿只不过是临时的“周转房”，父亲在前王公厂胡同已购置了房产，正在装修之中。这绝不是一般的换地板革、吊顶、包暖气片……这是翻建，据说原有建楼的想法，不知什么原因打消了。在我与父亲接触的不长的过程中，他有一种追求最高级、最时髦、最贵的物质享受的秉性，毫不夸张地讲：一掷千金。庆幸我没有继承他的这种秉性。

在近千平方米的大小五个院子的旧宅门的基础上进行翻盖，这确实是一桩不小的工程。房子修成后，为了在中院及后院栽种三池竹子，还花了不少时间，不知最终是从什么地方“引进”来的，粗壮、挺拔，郁郁葱葱的竹林，虽不开花，也非常惹人喜爱。这三池竹子直到80年代，改革开放后，争盖小棚、厨房，已经砍伐殆尽，至今连池子的痕迹都找不着了。

入住前，妈妈曾带我们去看过房子，与国会街的住房相比，这简直是鸟枪换炮，天壤之别。房子翻建的规格、样式、标准，在当时当地的住房中，与清朝末期的状元刘文林家可以媲美。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讲，新的、宽大、高档的住房很吸引我们，更让我们着迷的是，雇用的看房人老王头，他是车夫老王的父亲，据说他也是花匠。人未住进去，花已陆续运到了，包括无花果、橡皮树、夹竹桃、桂花树、两池荷花……这总得有人看管，不要说修剪了，就是浇水吧，也得费点儿工夫呢！

老王头矮墩墩的，脸黑黑的，说的一口带儿字的北京腔。他最擅长讲故事，特别是关于花仙子、狐仙、女鬼的故事，讲起来有声有色，说到妖风乍起，他能很逼真地吹响风的声音，令我们汗毛倒竖，惊恐万分，仿佛身临其境一般。当大姐进入中学后，她挺喜欢文学，在读了大量的书籍后，她告诉我们，老王头讲的故事，大多来自《聊斋》《镜花缘》等名著，但没有一个故事是遵照作

者原作,全部是进行篡改,张冠李戴,但当时听起来还是非常动听的。到底是老王头有意进行加工,还是年纪大了将主人翁们混淆在一起,自身就难以分辨,现在也就无从考察了。

搬进新居时,还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“剪彩”仪式,全北平的煤行界的商人,集体为父亲送了一块巨大的匾额,悬挂在垂花门厅,上书“见义勇为”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,显得威严、肃穆、气派,颇有如今电视剧中,为民除害的山寨王大堂中的气氛。为什么要送这块匾,连母亲也不能讲清事情的细节。

“……当时他并没有钱,在大煤商的眼中,他都算不上什么小股东。煤在日本统治时是被当局控制的战略物资,大概北平市在煤的销售环节上出现了岔子,运转不动了,日本鬼子着了急,将煤商们全部召集起来,询问情况,没有人胆敢站出来讲话。他是穷小子,没有‘包袱’,挺身而出……日本鬼子看中了他,煤商们也庆幸自己找到了代言人……”

匾是什么时候摘下来的,国民党时期?解放后?记不清了,但要除去匾额上的字还颇费了番工夫,刀砍、斧劈、铲子铲,后来用电锯锯开,母亲用它作为养花的搁板,它超常的结实,放上百十来斤的重量,也不会断。

搬进新家后,就如同进入了“鬼门关”,尽管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吃、穿、住都是“屎壳郎变知了”,一步升了天,可院子里总是阴云密布,父母的争吵不断升级,不仅次数增加,“力度”也不断在加强。父亲自然是挑起战争的一方,母亲十分倔强,也不甘忍气吞声,最让我们胆战心惊的是,最后竟发展到“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”,有时母亲不在家了,父亲竟把怒火倾注在我们身上。虽然院子很大,但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立命藏身之所,不论躲到哪里,都会被揪出来,甚至爬到床底下,也被他拿竹

竿捅出来。作为一个尚未读书的孩子来讲,在心灵深处所造成的创伤是终生都难以抚平的。

惟一值得庆幸的是,我靠着曾短暂地念过两次一年级,在众多的考生中,考取了师大二附小。这对于我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我非常珍惜在学校的时间,宛若受尽了劳役之苦,有了“放风”的机会,尽管那时间是十分短暂的,但对我来讲是太宝贵了。

至今记忆犹新的是,我是班长,放学后,我要例行站在一个高台阶儿上喊口令后,大家再分路散开。当我站进自己的路队之中时,真有一种重新又投入监狱的痛苦。我边走边想,不知家中又有什么深重的灾难在等着我,沿路一些破落低矮的院子,令我十分羡慕,那里有我终日想渴望得到的安宁和欢乐。

这时是家庭经济的鼎盛时期,母亲常说:“只有挣没有数的钱时,才能算富有!”可我们却没有幸福。